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ZHONGGUO LIXUE LUNLI
SIXIANG TONGSHI

宋代卷

陈谷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

宋代卷

陈谷嘉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长沙

君年食

内 容 简 介

全书首先梳理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系统和概念系统,然后分北宋和南宋两个时期,对各时期著名理学家的伦理思想特点、内容及实质、产生该思想的历史背景进行了剖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宋代卷/陈谷嘉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0. 12

ISBN 978-7-5667-2106-8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理学—思想史—中国—宋代 ②伦理思想—思想史—中国—宋代 IV. ①B244 ②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70825号

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宋代卷)

ZHONGGUO LIXUE LUNLI SIXIANG TONGSHI (SONGDAI JUAN)

著 者: 陈谷嘉

策划编辑: 王和君

责任编辑: 王桂贞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 31.5 字 数: 395 千字

版 次: 202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2106-8

定 价: 110.00 元

出 版 人: 李文邦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营销部), 88821335(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wanguia@126.com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营销部联系

前 言

我的人生中虽有一段行政工作经历（主要是担任岳麓书院行政领导工作），但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 19 部。其中，个人独著 11 部，即《岳麓书院名人传》《张栻与湖湘学派研究》《儒家伦理哲学》《社会理想志》《中国思想文化论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张栻评传》《中国文明起源与路径的研究》；与其他学者合著的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中国德育思想研究》《湖湘学派源流》《中国书院史资料（上、中、下）》《中国书院辞典》《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伦理学纲要》《书院文化论集》。除学术著作之外，出版了记叙个人人生经历的自传《岁月留痕——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我的学术著作，大部分成书于我退休之前，是在祖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推动下完成的。

1978年7月，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会议由胡乔木主持。这是具有学术和政治双重意义的大会，是推动思想解放的大会。在会议推动下，全国掀起了空前的思想解放大潮。我与许多学者一样，受到“科学的春天到来”的极大鼓舞，从而重新走上了学术研究的征途，结束了达15年之久的封笔，开启了我前半生的创作高潮。

2003年，我67岁退休，进入人生的晚年，夕阳虽好，但近黄昏。虽然年老体衰，但想到20世纪“文革”内乱时期耗去的宝贵时光，心有不甘。只要身体条件允许，一定要发挥余热。因此，在我晚年出现了学术研究小高潮。出版了《宋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06年）、《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0年）、《明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5年）、《清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2019年），对以伦理为本位而支配宋至清四代近千年，在思想文化形态中占据主流地位的理学伦理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是填补了元代理学伦理思想研究的空白。采取思想史和社会史相结合的理学伦理思想研究向度、综合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理学伦理思想研究思路，梳理、阐述和总结了理学伦理思想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体系、学术特质、发展脉络、发展规律、历史影响和价值，旨在挖掘、阐释对今天思想道德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因素与启迪意义的道德修养观和修养方法

论。以伦理为本位研究理学（新儒学），这是我多年前立下的心愿。曾记得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对恩师侯外庐先生表示，我不想走理学研究的老路，即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立论，把研究框死在物质与精神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里面，我以为从先秦儒学到宋代实现儒学变革的新儒学即理学，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我想尝试以伦理为本位研究理学，我的想法深得先生的称许。在上述四部断代理学伦理思想史专著中，我始终贯彻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研究主旨和取向。

上述四部理学伦理思想史著作出版后，得到了学界和其他读者朋友的肯定。学者同道和湖南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反映，四部著作是分不同时间出版的，时间跨度较长，有的已经没有库存，不方便读者成套购买和阅读，建议我对原著进行修订，书名改为《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分为宋代卷、元代卷、明代卷和清代卷，集中出版。四卷断代伦理思想史著作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系，贯通了理学伦理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建构了宋元明清四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反映了理学伦理思想的整体发展脉络和发展规律，合起来叫《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建议，我认为有道理，遂采纳之。我对原著的修订主要是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修改了一些表述、订正了一些引文错误以及删除了个别内容，如在清代卷，增加了思想家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

另外，《中国文明起源与路径的研究》《张栻评传》《中

国思想文化论集》《岁月留痕——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等都是我晚年完成的，它们与《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一起见证了我晚年学术著述的艰辛与快乐。

值此《中国理学伦理思想通史》四卷付梓之际，衷心感谢各位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敬请广大读者对本书进行批评指正。

陈谷嘉

目 次

绪 论	1
-----	---

理学伦理思想综合编

概 论	11
第一章 北宋社会与理学	13
一、由分裂走上统一的宋初社会	14
二、国家统一后的宋代社会矛盾和危机及理学的酝酿	19
第二章 理学的兴起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复归	31
一、北宋时期史学研究新潮的兴起及其对理学的引领	32
二、北宋时期的思想整合及理学建构	43
三、理学的兴起和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与振兴	59
第三章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及其基本问题（上）	82
一、宋代理学中的天人关系问题	86
二、理学人性二重说	108
第四章 宋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及其基本问题（下）	143
一、“居敬”与“格物致知”	143
二、宋代理学中的义利、天理人欲问题	158

北宋时期理学家伦理思想编

概 论	193
第五章 理学开创时期周敦颐的理学伦理思想	194
一、“开伊洛之先”的“宋初三先生”	194
二、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理学伦理思想	205
第六章 理学奠基者张载的理学伦理思想	220
一、“为天地立心”的人学思想	222
二、二元结构的人性体系	234
三、“变化气质”修养论	247
第七章 理学伦理思想理论形态的确立者二程的理学伦理思想	260
一、天理的道德本体说	260
二、“性”与“气”俱备的人性学说	272
三、“澄治”的修养工夫	284
四、义利、理欲之辨	299

南宋时期理学家伦理思想编

概 论	319
第八章 “开湖湘学统”的性本论者胡宏的理学伦理思想	320
一、“性”是宇宙和道德的本体	321
二、无善恶的人性论	333
三、“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	344
第九章 张栻的理学伦理思想	355
一、“性”的本原说和义务本位的道德规范系统	356
二、人性二重结构说	370

第十章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伦理思想（上）	387
一、朱熹的生平与历史地位	387
二、道德缘起于“天理”	390
三、性同气异的人性论思想	402
第十一章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伦理思想（下）	425
一、“格物致知”与“居敬”的道德修养论	425
二、义利、理欲之辨	445
第十二章 心本论者陆九渊的理学伦理思想	464
一、“心”是宇宙和道德的本根	465
二、“存心、养心、求放心”的道德修养	476

绪 论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或者说是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几乎为学者们普遍认同。号称新儒学的宋代理学究竟“新”在何处？它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有何时代印记、有何理论上的突破？如果说宋代理学在古代儒学发展史上进行了重要变革，那么它是如何体现其变革精神的呢？上述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对宋代理学或者对中国儒学的研究和评判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把宋代理学称为新儒学，这是十分得当和恰切的，因为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新。由重注疏训诂转向义理治经是中国古代学风和文风的大转变，从定于一尊的政治权威理论的儒学向古代先秦时期学理性儒学的复归，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封闭的儒学向儒分为派、派中有派而自由争辩转变，特别是儒、道、佛的融合，这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的一个极大变化；等等，无不体现理学之新。可以这样说，把理学概括为新儒学是最恰当的，可谓抓住了宋代理学的实质。

宋代理学之新最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是，它实现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凸显了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学特色，开创了一个由汉代单纯的官方意识形态（即统治思想）转向意识形态文化和意识形态文

化双重起效的新阶段，恢复和再现了儒学作为理念形态文化和学理性儒学的魅力。宋代理学的兴起和对儒学的新建构，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改变了儒学的命运，解除了儒学发展的危机。

众所周知，儒学在汉代有过发展的辉煌时期。最突出的是它由过去的一般学派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由曾受秦王朝残酷打压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汉代统治者笃信的政治权威理论。儒学的这种变化虽然奠定了它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统治地位，但它在被套上种种光环的同时隐藏着发展的危机。要言之，自汉代以儒治国之后，儒学的神圣性已无可置疑，但政治的魔力蚕食着它的学术灵魂，极大地挤压了它的学术空间，使它失去了学术品性，特别是作为人学和深蕴人伦之理的儒学失去了它昔日的魅力。在汉代，儒学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并由此走向了僵化和衰落，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虽经白虎观会议的强化和东汉谶纬学的神化，但儒学的风光不再。及魏、晋、隋、唐时期，儒学更是一蹶不振。盛极一时的儒学，既受玄学的挤压，又受佛、道的冲击，无以面对现实的挑战，既无先秦时期之“显”（先秦儒学称为显学），也无汉代之“威”（汉代儒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儒学进入它历史上最低谷的时期。

宋代理学家们虽然以复兴儒学标榜自己，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但他们复兴儒学不可能照抄照搬汉代儒学，也不可能要求统治者凭借政治力量再次定儒学于一尊。理学家们复兴儒学，虽然也包括恢复儒学治国的外用功能，但更关键的是要再显儒学同佛学一样“治心”的内用功能，使儒学的外用功能与内用功能相结合。儒学的外用功能已为历史所认证，内用功能因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已不复存在，因而佛、道在这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诚如佛教高僧契嵩所

说：“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①契嵩指出儒学与佛学是治国与治心的区别，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儒学不能内用即治心只是汉代已被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的事，原典儒学并非如此，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孟子的“养心”理论就充分表明了这点。要改变儒学能治国而不能治心的状态，要回应佛、道的治心和治身的理论挑战，唯有恢复儒学原有的学术品性，重新阐发原典儒学的人伦本义。宋代理学家没有辜负时代的使命和期待，他们在建构理学体系中回归了先秦时期的学理性儒学，破弃了汉唐的传注儒学。可以这样说，新儒学体系的建构是围绕阐发儒学“治心”内用功能而展开的。为此，他们把重在阐发心性之义的“四书”提升为经典，与“五经”并列，使其重要性盖过“五经”，这不仅使儒学所依托的经典数量扩大，而且突出了经典中之经典“四书”的地位。不仅如此，理学家撇开近八百年盛行的汉唐注疏，从早期先秦儒学中直取本义，重点阐发了儒家的心性之学，突出了儒学的人伦本义，突出了原典儒学是集人伦之理和自然之理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再现儒学的学术魅力。另外，随着对汉唐注疏训诂治经学风的破弃，今古文熔于一炉，文风和学风大变，仿佛回到了儒学自由讨论的先秦初创阶段。总之，经过宋代理学家对新儒学的理论编织，儒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外用与内用双重功能起效。

理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的儒学体系，固然因其理论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实现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回归和振兴，但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另一方面的重要表现，即它体现了时代的要求，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① 契嵩：《潭津文集·寂子解》卷八。

汉代儒学之所以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除了它以儒为主干综合先秦百家说而建构了汉代儒学即经学之外，还在于它适应了刘汉帝国统治的要求和时代的期待。具体言之，汉代儒学与法家学说融合所构成的政治权威理论，迎合了刘汉统治者的需要，开创和奠定了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儒治国的传统。另外，儒学与阴阳家结合所确立的阴阳尊卑理论适应了汉代社会维护等级特权的要求。历史表明：一个时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儒学而不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儒学，并非儒者主观上的自由选择，而是由时代决定的。宋代理学从理论到形式都与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我们都知道，赵宋立国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的轮替不一样，它是通过“黄袍加身”的军事政变实现的。虽然它付出的代价极小，但背上的历史包袱极为沉重，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举其要者言之，为了稳定政变后的统治，统治者既要维持旧的官僚集团，又要培植新的统治基础，大兴科举取士，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冗官现象，庞大的官僚集团严重影响了政治上的效率。其次，赵匡胤实施权钱交易，以金钱和物质享受收买百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和恩宠百官的举措。权钱交易导致政治腐败、百官贪侵的后果。再次，政治腐败、官吏贪婪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出现了空前的道德危机，儒家人伦道德的权威已不复存在。另外，面对金、辽、西夏等外敌入侵，统治者苟且偷安、乞降求和，民族气节丧失殆尽，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内忧与外患并至。作为时代精英的理学家群体，对以上社会的弊病不可能熟视无睹。事实上，理学家们已在理学中对此弊病作出了颇有针对性的理论回应，并采取了相应对策。基于官场权钱交易引发的官员对物质享受的攀比，理学家们有针对性地提出天理人欲之辨，期求以天理对人欲进行节制，反对人欲横流；针对统治集团的腐败，理学家们

极力倡导修身，以“格物致知”的途径培养道德意识，提高道德认识，以“自反”的途径省察内心道德与非道德的矛盾运动，把道德修养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将道德修养的理论阐发成理学伦理思想的一个亮点和极具特色的组成单元；针对宋代社会道德沦丧而出现的道德危机，理学家们把宇宙本体与道德本体融为一体，从宇宙本体的高度论证了道德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提升了儒家人伦道德学说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政者，正也”，宋代社会的弊病及由此加剧的社会矛盾，均是由行为不正的统治集团导演的，因此，如何使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为一个走正道的人，垂范天下，发挥非权力性影响，成为理学家们讨论的焦点问题。理学家们重新阐发《大学》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提出，要治国平天下，唯有加强道德修养，唯有从统治者的个人修身、齐家做起。揭橥史实，理学家们对宋代社会的弊病和矛盾几乎都在理学伦理表现形态上有所反映，几乎都打上了时代的印记。理学家们所热衷讨论的诸如天人关系论、二重人性结构论、天理人欲辨、“致知”和“自反”的道德修养论，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所使然，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印记。正因为如此，宋代理学伦理思想从内容到形式与汉代儒学有很大不同，它不是原典儒学的再版，而表现出了一种新的时代风貌。

再次，宋代理学对儒学的刷新，还表现在它打破了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的封闭性，它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对近千年的传统文化作出了以往历史上不曾有的全面审视和评判。虽然在近代历史上出现过康有为对两千年儒学发展的全面考察，对其历史价值作出过评判，但康有为的批判只限于儒学本身，未及其他。另外，康有为对汉代后的儒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流传千载的儒学称为伪学，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被伪学所笼罩和支配。宋代

理学家们对儒学则不如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是全面的，虽然以儒学为重，但旁及了佛、道；虽然批判儒学，但并不是不加分析的全部否定，而只直斥汉唐流行的传注，在扬弃僵死的汉唐儒学的同时，对唐代韩愈、李翱儒学都极加赞许，并以他们的后继者自诩。理学家虽从理论上对佛、道展开横厉无前的批判，指出佛学“弃道德、悖人伦、裂五常”，但对佛学的“治心”的性命之学加以肯定，承认“佛似大智慧，独见情性之本”。对道教亦如此，在批判中有继承。理学家们在建构理学中吸取佛、道的思想成分，为当今时贤所认同，谓理学实现儒、道、佛三教合流。在理学的建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精神。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精神就是儒学的一种革新精神，也是激活儒学生机与活力的精神。理学成为新儒学的思想体系，这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精神是紧密相连的。

中国理学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时空跨度很大，历宋、元、明、清时代，含创始、演变到衰亡的全过程，不但内容上有极大的变化，而且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因此，企图对流传千载且呈现不同阶段的理学简单地从理论上加以描述和概括是很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本书对理学伦理思想的探讨限定在宋代这一特定的时段。历史一再表明，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在讨论重大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展开的，并且都以这些理论问题为支撑。宋代理学伦理思想体系建立同样如此。那么宋代理学家们具体探讨了哪些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呢？简言之，有如下几个基本问题。其一，天人关系问题成为理学家们首选的问题，气本论、理本论、心本论和性本论都对天与人的关系作出了回应和概括，这既是哲学本体论，也是伦理学的道德缘起论，前者是伦理学的论证工具，后者是哲学本体论的出发点。它既以天道论人道，也以人道论天道，“天人合一”成为哲学与伦理学的双重命题。因为

它一方面使伦理哲学化，另一方面使哲学伦理化，天人关系具有伦理和哲学双重意义。其二，由于宋代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失落，人性问题成为理学家们普遍关注的问题。理学家们对历史上缺乏规导力和解析力的传统人性论重新加以诠释，提出了二重人性结构说，以天地之性和气禀之性对善与恶作出了新的解析，把人性论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三，为了整肃朝纲、净化社会、醇化心灵、提升人格，理学家们把道德修养提到空前的高度，“居敬”“自反”“格物致知”等修养命题被理学家们反复讨论，既被看作伦理学问题，也被看作哲学问题，道德修养论与认识论相融相合，成了理学伦理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其四，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历来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但理学家把此问题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未见的。义与利、天理与人欲之辨，几乎成为所有理学家的聚焦点，有的理学家提出天理人欲不并立，有的理学家提出“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但从总体上说，都主张以义导利和以天理节制人欲，反对见利忘义，反对人欲横流。以上既是宋代理学所讨论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宋代理学的理论框架。宋代的理学建构既以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为基础，其体系也可以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来概括，与以往的儒学相比，宋代理学似乎可概括为外用与内用相结合的体系。质言之，“治国”的外用功能和“治心”的内用功能的结合，使工具性儒学和学理性儒学得到了统一。

宋代理学虽然只是整个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它经历了理学的开创、奠基和确立以及演变的过程。北宋时期是理学的开创、奠基和最后确立的时期，理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系统和概念系统均已确立，宋代理学家们所要讨论的伦理学基本问题在此时期已展开，涌现了一大批理学家，形成了一个理学家群体，“北宋五子”周敦颐、